

一代名师育桃李

——忆著名历史学家陈振江先生

于树香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陈振江先生始终恪守史学家的使命与担当,自强不息,刻苦自励,笔耕不辍,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仍以“壮心不已”的气概,著书立说,倾尽毕生精力与心血,作出了突出贡献,享誉海内外学界。斯人已逝,风范永存。缅怀先生,山高水长。

以史立身 以史明理 以史育人

陈振江先生于1955年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雷海宗等教授。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在恩师杨翼骧教授指导下,研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兼涉史学史。1964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深造,师从汪钱教授学习隋唐史,多次拜见和向学于翦伯赞,向达诸前辈大师,面聆教益,受益匪浅。正如陈振江先生所言:“南开、北大诸前辈的教诲和指导,给我打下了治学根基。”

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陈振江先生始终秉承“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初心与使命,把教学作为重中之重,力求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陈振江先生教书育人极具鲜明特色:以德立身,以史明理,以史育人。读博期间,我有幸系统地聆听陈振江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概论》《通商口岸与社会文明》等课程。陈先生学识渊博,专业精深,功底扎实,记忆力极强。上课时总是精神饱满,常面带微笑,话语抑扬顿挫,仿佛有一种乐感而别具特色。先生授课,挥洒自如,引人入胜,既说明前因后果,又揭示性质意义,层层递进,鞭辟入里,使人受用不尽。正如先生自己所描述的“将己之治学心境、理念与观念宣泄无遗”。

在讲到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苦苦探寻救国存亡之路时,陈振江先生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许多历史细节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精彩纷呈。他提示学生要牢记的是:所有这些先进中国人为了改变国家民族命运而起的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艰难但不可逆转地走向光明。

陈振江先生开设的有关近现代史方面的课程,使我们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正是由于陈先生寓教于学、寓教于趣、寓教于心的近现代史教育,厚植了学生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了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奋发有为的自觉。

史学功能 史家素养 治史学风

关于历史学的功能,陈振江先生历来主张:“不管给历史学归纳几种功能,但‘资政’功能,即为现实服务,为治理国家、社会和国民提供依据和借鉴的功能,和它的‘教化’功能(即教育功能),都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不可忽视。”他还提出,史学家应该具备德、才、学、识的基本素养,强调“史德,即治史者的学风也”。只有四者兼备,才能“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写出“鉴既往之例,示将来之风潮”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陈振江先生始终以超强的学术研究定力,“严谨治学、立品自爱”,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一帜。这里,仅选三篇文章,体悟陈振江先生“史学·史家与时代”的综合素养和治学心境:

一、前瞻性选题与引领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华书局开始恢复编辑和出版业务,派编辑到高等院校征求意见和选题,第一站到南开大学历史系,陈振江先生提出《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的针灸》两项选题,他们当即向陈先生约稿,陈先生只答应撰写《丝绸之路》,并建议《中国古代的针灸》请中医专家来写。陈振江先生发表的《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一文,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讲起,“他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贯亚洲内陆的东西交通要道,形成了天山南麓和昆仑北麓两条通向西域的交通干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他用那一串串古老而现代的地名,连接起了丝绸之路这条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大道,它犹如一幅优美的画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遥远而清晰。文章穿越两千多年历史,精选汉武帝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朝等不同时期,具有重要历史节点的各国使节、使团、商旅和商人等,具体而又详细地讲述在丝绸之路发生的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故事,饱含深情地赞美古代中西各国人民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集体智慧,乃至鲜血和生命铺平了丝绸之路的大道,通篇闪烁着亮点与精彩。文章不仅展示了陈振江先生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热爱与传承,而且展示了中国古代史的深厚功底,更展示了他研究中西古代文明交流的超前意识、敏锐思考与重点把握的能力与水平。此文发表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意义自不待言。

二、启发性研究与兼容并蓄。1999年下半年,陈振江教授应邀到哈佛大学杜明教授邀请,到哈佛大学东亚学社作高级访问学者,与杜教授合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课题,形成《论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杜明、陈振江教授对话录一文。2002年《南开学报》(第3期)刊发此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影响。两位著名史学家从历史的维度和不同的文化视角,就中国传统文化转型问题进行解读,多次对文化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和一系列难题进行深入讨论,亮点纷呈。先生提出了“乾嘉学术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峰巅”,也是“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

的开端”的深刻见解。特别指出18世纪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学人创造不出足以牵动传统文化向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转型的“蒸汽机”式的文化动力源。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时,陈振江先生把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概括为:“经世致用型”“中西互用文化型”“融合中西的新学文化型”“科学的现代性的五四新文化型”。强调五四新文化型,“是中国近代新群体在学习西方和改造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结晶,也是全面引进和构建后现代性新学科的里程碑”。这四种文化类型与文化现象,都与西方文化的传入、碰撞、交流相关。陈先生认为: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和吸收西学,进而融汇中西,构建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新文化。陈振江先生的论点论据以及透彻分析,赢得杜明教授的契合与赞同。在《对话录》的最后,陈振江先生指出:“不论是洋务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实质上都是梦想中国成为富强的社会。”

三、开阔性视野与真知灼见。1991年,陈先生在《近代史研究》发表《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约2万字的文章。陈先生以科学的历史观,开阔的胸襟,包容的心态,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研究探讨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近代文明的由来与历史轨迹,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陈先生从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入手,客观分析了其殖民化的加深和近代文明的建立与传播“一身二任”的特点。陈先生认为:通商口岸从鸦片战争开辟“五口通商”算起,世界资本主义利用战争侵略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多个通商口岸,“作为它们扩大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基地和跳板”。“遂使这里既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典型地区,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和橱窗。”文章列举了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移植诸如西洋建筑、街道、市内交通以及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市政文明,当时成为许多中国人向往与追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蒙“读本”。在谈到通商口岸的近代工业时,陈先生指出:首先是由外国商人和殖民者为了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与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而建立的。他同时指出,“当外国人把机器生产和铁路、轮船运输移植到通商口岸的时候,中国人也在那步履

维艰地引进和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先由洋务派兴办军工和民用企业,继有民族工业的兴起”。兴办新式教育是传播与建设近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当年广州、上海、天津、福州、厦门、武汉等通商口岸,正是新式学堂的从集之地。伴随着欧风美雨的阵阵袭来,通商口岸的衣食住行和娱乐等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异与更新,遂成为社会生活习俗变革与传播的前哨与据点。夜总会、赛马场、舞厅、剧院等西式娱乐场所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京剧和地方戏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但是,西方的丑恶现象与行为也随着洋人洋货的涌入而夹杂进来,日益严重败坏了中国的社会风气。在文章最后,陈先生指出:“近代崇洋风气与近代文明的传播相表里,二者发展的轨迹是同步的”“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心态。”

以上三篇文章,贯穿了一条主线——中西文明交流史。从两千多年前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到近代文明的中西交流,无不体现出陈振江先生开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求实的学风和驾驭史学重要问题的能力与水平。

言传身教 师者如光 激以致远

陈振江先生40余载的教学生涯中,许多学生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也有一些青出于蓝,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饮誉学界。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者如光,激以致远。这些学子取得的成就也饱含着当年陈振江先生的教诲与指导。

我有幸成为陈振江先生的学生,面聆教诲,受益良多。回想自己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读博岁月,历历在目,陈先生授课、指导论文的情景,如在昨日。陈先生对学生标准高、要求严,诲人不倦,和蔼可亲。在陈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如期完成博士论文《天津开埠与文化变迁》。在文中,我首次提出近代天津文化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特点,并于2004年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得到广泛共识。在陈先生的鼓励下,我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近代天津文化,在公开报刊发表了10余篇与博士论文内容相关的文章,普遍受到好评。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把发表的文章或寄或送给陈先生时,他都非常高兴,会说许多赞扬和鼓励的话,勉励我不断进步。

2020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拙著《法国“进土”逐梦东方》后,我登门送书给陈先生,敬请先生指教。因脑血管后遗症已患病7年的陈先生,那天特意换了一身正装在客厅接待我,先生看到拙著非常激动!当我恭敬地把书送到陈先生手后,他双手捧着书,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而笑逐颜开,这时我看到先生很想说话又如哽在喉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陈师母说,陈老师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此时此刻,我想起陈先生当年为我们授课时的神采飞扬,真是百端交集,感慨万千!

陈振江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志者青春”的精神,渊博精深的学问、严谨治学的态度、求真务实的学风,永远感染和激励着我们勇毅前行。

2022年12月8日

作者系1998级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陈振江教授,2002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出版有学术专著《法国“进土”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考察探险记》,获评2020年人民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

题图摄影:刘佳

《战斗的青春》是作家雪克创作的一部反映冀中军民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自1958年出版后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短短几个月销售12万册,1960年修改后的新版截至1966年6月累计印数达九十多万册。著名评论家冯牧赞扬《战斗的青春》有着“浓烈的战斗气息和生活气息”“有着真正的生活土壤所赋予它的强烈而质朴的生命力量”,是“真正从生活土壤的底层孕育成熟的作品”。

“塑造新的英雄形象”,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实践中的重要课题,崇高伟大的英雄形象鲜明诠释着革命意识形态,并凭借极具时代特色的美学原则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作为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女性英雄人物,《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无疑有着独特的魅力。许凤原本是区妇救会主任,对区委抗战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在地方武装和干部损失严重、情况危急的情况下,她临危受命,担任区委书记,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在被捕入狱后还秘密对伪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小说并未赋予许凤这个人物“传奇”“神性”等当时通行的英雄人物的审美特征,而是在真实展现了一个普通妇女干部的成长历程。许凤在参加革命斗争时曾得到胡文玉的不少帮助,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爱情,所以最初面对胡文玉的思想问题时,她缺乏冷静的分析。当刚刚打开的局面被敌人破坏,工作方法不被理解、正常的战友情谊被曲解且错误地使用时,许凤也表现出委屈低落的情绪,但她始终相信党会正确处理一切。战火的历练让许凤迅速成长起来,从天真热情的姑娘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样鲜明饱满的人物,还有小说中的游击队长李铁。他英勇机智,化装成便衣特务带领队员们突袭敌人据点,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鼓舞了群众的情绪。他豪迈直爽,面对胡文玉的投降主义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怕打

仗!怕死”,面对上级组织对自己的误解,他坦荡地说出:“有多大风叫他们刮吧。自己站得正,是刮不倒的……我凭着自己的党性去进行斗争。”这些个性化的行动和语言,和人物性格有机联系在一起,使得李铁这个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

作为一部反映革命斗争的历史小说,《战斗的青春》传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极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外号“孙猴子”的侦察班长武小虎在一出场就被宣布“牺牲”了,队员们听说后都十分悲痛,可没过一会儿,就见武小虎满面笑容地回来了。原来他在躲避敌人追击时,碰巧遇到村里有名的“傻宽”,他急中生智,向伪军谎称自己是来给“傻宽”说媒的,“傻宽”的憨言痴语逗得敌人哈哈大笑,觉得抓错了人,便把人放了。在惊险紧张的情节中加入轻松愉快的场面,既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性,使武小虎化险为夷显得更加合理,又让革命英雄潇洒机智的形象自然地印入读者心中,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心理。

“抢救”一节中,朱大江带领部队突袭,试图突破敌人包围,营救被捕的许凤,他们“满怀仇恨,一腔怒火……像群猛虎一般,跳起来猛扑上去”“狂风似的子弹、手榴弹向他们(敌人)打过来……像刀枪不入的神兵天将……敌人被打得手足无措,混乱地挤着,撞着,跑着”。英雄的勇猛群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营造出一种天兵天将斩妖除魔的修辞想象,使得文本呈现出生动传奇的色彩。

战争的残酷性很多时候是通过交战双方的死亡来体现的,而英雄人物的牺牲则被赋予了更多道德情感,正如孙犁在谈到战时英雄文学时曾言:“我们要不要悲壮的东西?要。但不需要悲哀的。悲哀的作品可以挫伤我们的斗志,但悲壮的作品却可以激发人们的健康的战斗的感情。”

《战斗的青春》中,许凤、秀芬、小曼三姐妹被捕后的结局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写重构。在1958年初版中,三姐妹高呼着口号,昂首挺胸,英勇就义,但在小说刊发后,许多读者写信表达对三姐妹牺牲的不满,表示愿意“让三姐妹活下来,和我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于是雪克在1960年和1961年的版本中,对三姐妹的结局进行修改,在千钧一发之际,让三姐妹被冲进敌人据点的战士们营救出来了。可是,在新版印行后,又有一部分读者给雪克写信,表示“本来读到三姐妹牺牲时非常激动,改成现在这样,反而不感到激动了”。后来,雪克在1962版出版后记中反思到:三姐妹结局的改动在“现在看来显然是过分的修改”,因为“读者对生活和人物的愿望,同作品中人物和情节的逻辑发展,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于是在1962年版中,作者又将三姐妹的结局重新修改为“牺牲”,并在1978年版中重构了牺牲的情境:“他(渡边)一看见许凤那毫无畏惧的蔑视的目光,那从容的神色,那胜利者才有的神采焕发的面容,气得血往上冲”,三姐妹在即将行刑之际不屈不挠坚持斗争,许凤更是用身体掩护战友,她英勇牺牲后,“面带从容庄严的神色,好像完成一次战斗任务之后安然睡着了似的”。重新改写的牺牲情境,更加突出了英雄面对死亡时的崇高意志品质,消解了革命者就义的悲剧感和沉重感,赋予牺牲以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小说《战斗的青春》通过个性化的英雄形象、传奇生动的故事情节、诗意化的牺牲情境等讲述革命历史,真实再现了抗日军民的斗争生活。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小说,感受作品中洋溢的革命激情,对于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津红色文脉(九)

雪克:英雄书写与诗意建构

王谦

王谦

王谦

王谦

王谦

王谦

王谦

王谦

王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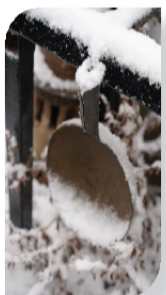
王谦

王谦

王谦

来日方长

杨仲凯



候啦。“数九”是个日,也是一种期盼。每九个自然日,就算做一个“九”,第二个九天,就叫做“二九”,依此类推,直到“九九”,不知不觉之间,就是八十一天过去了,就叫“出九”了。八十一天太漫长了,而把九天作为一个单位,九个九,日子就会过得好好得多。“九尽桃花开”,寒冬早就过去了,桃花都该开了,天气已经很暖和了。北方留传最广的冬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牛半遍地走……”

古人不像当代人过的节奏这么快,所以古时的知识分子有很多雅趣。在这八十一天不寻常的期盼里,古人也不闲着,要不然这寒冷的冬天又怎么能熬过去呢?

明《帝京景物略》载:“冬至日,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这就是古代文人所谓的“画九”,用以消解期盼中的苦闷,让寒冷而没有生机的生活有了乐趣。这是画梅花的方式,还有画圆圈填色的玩法,图画上有九个格子,每格有九个圆圈,根据阴阳晴雨雪的不同,晴天填红色,阴天是蓝色,雨天是绿色,刮风是黄色,下雪呢,当然是白色,……还有文字的图式,无非是写九个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这九个字古时的笔画都是九画,一共是八十一画,每天描红,出九的时候,正好写完,也别说文人无聊没事干,能在八十一天里天天如此,也是对一个人书法和心性的磨炼。

“候应黄钟动,吹出白葭灰”这是宋朝汪宗臣的词句,说的是我国古代音乐方面“律吕调阳”的事,白葭灰就是芦苇膜烧成的飞灰,当律管里的灰被地气吹飞出来,发出“噙”的声音,这就相当于当代音乐的定调,代表着冬至的来临,千字文里也有“闰余成岁、律吕调阳”的句子,“调阳”就是确定冬至和子时的过程,也颇可记述。

冬至的三候,一候蚯蚓结。在一年的七十二候中,这不是蚯蚓第一次出现,立夏的二候是“蚯蚓出”,而此时“蚯蚓结”说的是土中的蚯蚓蜷缩着身体开始冬眠,它们也拱不动了。

二候麋角解。麋感阴气渐退而解角,麋就是俗话里说的“四不像”,麋的角在冬至的时候脱落。而夏至的初候是鹿角解,麋和鹿常常并列在一起说,但解角的时间正好冬夏相对。

三候水泉动。在这最为寒冷的日子里,冰冻的泉水却也能感受到阳气,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并且是温暖的。

冬至是个非常特别的时点,那时北半球白昼最短而夜最长。太阳走到了最南端,从这一天开始,太阳直射点从南回归线向北一点点地移动,白昼长一些,黑夜就短一些。真的是肉眼可见的,一天比一天长了起来。所以,以“冬至”二字为谜面打一个成语,谜底是“来日方长”。

既然来日方长,那当然是个美好的开始。于我而言,冬至时候也真的是个重要的日子,我1998年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后正式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就是在当年的冬至日,那夜所见的人,那夜吃的饺子,那夜的场景的细节,都还记着清清楚楚,一晃24年过去了,记忆犹新。不是所有的冬至都让人记住,只不过我记住了这个,而别人记住的可能是那个。

题图摄影:峻凌

在城里种地

刘杰



新入住的小区属于城中村改造项目,北面靠近山洼,收尾工程没有结束,靠山洼那面还没有起围墙,人们可以随意登上小区背后的皇甫山。皇甫山是小城北面的主山,几十米甚至一百多米深厚的黄土堆积而成,这在盛产煤炭石山连绵的小城很是稀罕,也曾是县城西关村数千人口的山口粮地。

小区后面的山坡原是当地农民的承包地,城郊农民的身份置换之后,土地遭遇冷落,有些地块被种植了杏树、槐树和花椒树、核桃树之类的,也有少数地块荒芜着,蒿草成林,野兔出没,野鸡(雉)高歌。

没有围墙的限制,倒给了人亲近自然的便捷。喜欢清静的人早晚登山,嗅闻草木清香,欣赏野花绽放,锻炼和游山一乐两得。渐渐地,后面的山坡上就有了一条羊肠小道,蜿蜒逶迤,直达山顶。再后来,羊肠小道上就显得熙熙攘攘了。

后山坡真正的热闹始于一块又一块菜园的诞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后山坡的荒地被开垦出了一块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园地,那些新垦的园地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平整精细,人一看就心生欢喜。拓荒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以中老年男女居多,荒芜了数十年的田地重新焕发了青春。那些田地的主人冷落多年,突然间遇到知音,真是皆大欢喜。那些拓荒者多是小区里的住户,也有附近几个小区的中老年男女,他们都是被儿女拉差到城里带孙子孙女的。这些和土地亲密了大半生的老汉老婆,“被进城”之后难以融入城市生活,郁郁寡欢、茶饭无味,突然间寻找到了寄托,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压抑已久的热情有了释放的好去处。每日里除了吃饭的时间,从清早到暮色四合,每一块园地上都有忙碌的身影,他们不知疲倦地厮守在地里,好像不守着地就会飞了似的。一场春雨过后,地里铺上了黑色的、白色的地膜,栽上了辣子茄子黄瓜苗,点上了水萝卜西葫芦苗,撒上了蔬菜油麦菜勺勺菜苗……

土地最不欺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些人熟知土地的脾性,因地制宜,适时播种,精心侍弄,一块地比一块地葱茏,块块生机盎然,后山坡一扫荒芜的衰败。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厮守于同一面山坡,那些种菜的人就彼此熟悉了,每天早晚上下班一样扛着铁锹耙子,拿着铲子结伴上山,一同回家,歇缓的时候聚在一起拉闲话叙家常,当然少不了显摆自家儿女的出息,好在大家朴实的根本还在,只是羡慕不嫉妒。就是雨雪天气,小区避风的角落,也总有三五成群地爷奶聚在一起闲聊,谈笑风生,说得最多的还是自家园子里的蔬菜。

虽然每一块菜地里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家家的菜篮子里都种类齐全。大家互通有无,缺啥有啥,有啥有啥,萝卜白菜葱蒜大蒜,西葫芦南瓜辣椒番茄,色泽鲜艳,秀色可餐。城里人邻居间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被这些在城里种菜的人彻底颠覆。小区的收尾工程拖了三年还没有完工,起初还有人弹嫌,现在大家觉着北面没有围墙挺好的,不仅少了拘囿的感觉,还方便上山种菜,真应了那句老话:好事里头有瞎事,瞎事里头有好事哩!

今年末,我们小区被城市社区管委评为全县唯一的“和睦亲善小区”,让那些高档小区的住户们惊诧不已。

题图摄影:徐晋